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., Ltd.
亚太科學出版社
亚太社会科学
ISSN(O) : 3080-2121
ISSN(P) : 3080-2113
2026 年第 5 期

以宗派佛教为特色深化佛教中国化的发展

释心平
（武昌佛学院，湖北武汉，430000）

版权说明：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– 非商业性使用 4.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。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，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，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。

摘要：宗派佛教是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发展过程中的最具中国化的成果，是佛教与中华文化契理契机的深度结合。纵观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史，正是延着宗派佛教的理路不断推进，而近代以来的佛教复兴，也以宗派佛教的诸宗并进为其特征。又有太虚大师总结中国汉传佛教的宗派佛教之特色，融贯成为人间佛教的理论，为当代佛教所继承和发展。今日的汉传佛教，应当继承中国化的宗派佛教的理路，沿着人间佛教的发展路径，承前启后地深化佛教中国化，发展中国化佛教。

关键词：宗派佛教；佛教中国化；中华文化；人间佛教
DOI：https://doi.org/10.62177/apss.v2i5.1809

引言

宗派佛教是中国汉传佛教的特质之一，是佛教与中华文化彻底融合的标志，也是当代佛教继续深化佛教中国化应当践行的路径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：“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，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、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、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。”[1] 这指明要深入推进佛教中国化，应当继续深耕佛教与中华文化交融发展的成果，把中国汉传佛教的深厚历史传统，引入新时代的精神，承前启后，深化佛教中国化，发展中国化佛教。

因此，本文试着回到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与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过程之中，去考察佛教的宗派性格及其所展现的佛教中国化特征，特别是立足于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基础之上，重申人间佛教思想的根本精神，以此来为当代佛教的发展与佛教中国化的深化提供启示。

一、宗派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质

从佛教进入到中国的土地开始，就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互结合，在互鉴互融过程中，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以东汉末年的“永平求法”为起点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序幕就已经拉起。此后，佛教的发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借用中国传统的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意涵的“格义佛教”，再发展到隋唐时期三论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等宗派的成立为标志，中国汉传佛教形成了以教、禅、净、

律等为特色宗派佛教。可以说，宗派佛教的形成，是中国化佛教臻于成熟的标志。

从中国汉传佛教发展的内在视野来看，隋唐时期佛教的“禅开五叶，教创台贤”，无疑是中华文化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之一。其中，以智者大师为集大成的天台宗最具典型。天台宗以智者大师所讲的“法华三大部”，即《法华文句》《法华玄义》《摩诃止观》，以及大师所阐《童蒙止观》《六妙法门》等教典为理论基础，以它们所阐释的“五时八教”和“四种三昧”等理论与禅法为指导，将佛法的一代时教与修行指导，巨细靡遗的整理出来，成为中国化佛教的典范。也因此，智者大师和天台宗赢得了“东土释迦”和“教观双美”的崇高赞誉。此后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，将完整的唯识思想补充到汉传佛教的义理系统之中，形成了唯识宗。而稍后的贤首法藏大师则吸收了唯识宗的义理，梳理出“五教十宗”的新教判和“法界观”的修行路径。从此，教下诸家可谓齐备，汉传佛教的义理思想如皋日中天，璀璨于当时，光耀至当今。

禅宗经历了从南朝梁代到唐代的发展，与中华文化彻底交融，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宗派。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，从魏晋南北朝的竺道生，发展到到唐代的禅宗六祖惠能，佛教中国化历程才算完成，他说：“生公为佛学中国化栽根，到惠能时才开花结果。”[3] 这也说明中国佛教发展到隋唐时期，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，成为其不可割离的部份。

另一方面，唐代道宣律师疏解律藏，探索中国化的僧团律制，提出“今欲删其繁恶，补其遗漏，使制与教而相应，义共时而并合”[5]，遂发展出具有适合中华文化与中土民情的中国佛教律制。并在后世的发展中，形成学律、行律的中国律宗。此后，百丈怀海禅师倡创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[6] 为特点的丛林制度，为适应中国的农耕文明传统建立起农禅并重的僧团修行模式，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制度特色，至今遗风尚存。

宗派佛教在宋元时期得到更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，寺院开始有专门弘扬天台、华严的教理的“教寺”，也有以禅门修行为核心的“禅寺”，其宗派佛教的性格极为明显。到了明代初期，中国汉传佛教的佛寺形成了禅、讲、教的格局，这其中不乏有宗教管理上的方便。到了晚明以降，中国汉传佛教寺院逐渐演化出禅、教、律、净的格局，这无疑是宗派佛教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表达。

简而言之，宗派佛教不仅是佛教与中华文化交融发展的标志性成就，是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主轴，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特质。需要补充的是，中国佛教各宗派之间不是“入主出奴”彼此隔绝，而是相互扶持、相互补充，具有包容性。宗派佛教的精神，亦在于其有戒律、有教理、有禅观实践，以戒、定、慧三学并进为根基，这样的精神应当为今日佛教的发展所继承与深化。

二、近代佛教的复兴以宗派佛教为标志

清代中后期，在列强环伺、社会积贫积弱的历史环境之下，佛教的发展也备受打击，可谓衰落已极。近代高僧“八指头陀”，即敬安禅师曾慨叹道：“嘉、道而还，禅河渐涸，法幢将摧。咸、同之际，鱼山辍梵，狮座蒙尘。池无九品之花，园有三毒之草。息心靡托，了义何闻？”[2] 可见当时佛教的衰弱情形，和出家人的危机感。与敬安禅师同一时期的佛门居士杨仁山也说：“境内禅宗一派，空腹高心，西来大意，几成画饼。台教一派，尚能讲经，惟泥于名相，亦非古法。且诸方名刹，向无学堂造就人才，所以日趋于下也。”[13] 如杨仁山居士所见，晚清的佛教仅有禅宗与天台宗能够勉强支撑起修学与弘化的规模，而其效果也未臻理想。

有鉴于此，近代缁素大德寻求振兴佛教，于是有妙空法师、冶开禅师、杨仁山居士、曹耀湘居士等高僧大德相继募刻教典，创办了诸如金陵刻经处、毗陵刻经处、如皋刻经处、长沙刻经处等集佛典整理、刊印、流通为一体的文化机构，为近代佛教复兴积蓄了教典的基础。教下的天台、华严、唯识诸宗也因

此在晚清渐有起色，尤以弘扬天台宗之谛闲法师与发扬贤首教义的月霞法师为僧界表率。谛闲法师于江浙遍开讲席，重振天台宗风；而湖北高僧月霞则于 1896 年在九华山开讲《华严经》，重兴贤首宗风。此后，两位高僧分别创办了观宗学社与华严大学等近代专宗僧教育，为中国近代佛教培育了众多专弘天台、贤首两宗的僧才。与两高僧同时及稍后时代，有虚云禅师、印光法师、弘一律师等高僧分别弘传禅法、净土与律学，使得各宗宗风再振。由此观之，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正是以宗派佛教为其特色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月霞法师的两位得意弟子——持松法师和体空法师，他们在 1924 年被分别选为武昌洪山宝通寺方丈和武昌莲溪寺方丈。在是年 2 月 15 日，由太虚大师的弟子大勇法师代表武昌佛学院，会同武汉佛教界僧俗代表，在汉口佛教会开会欢迎两位大师回到湖北弘法。[14] 持松法师在宝通寺复兴汉传密宗，他坚持以贤首宗的判教为依据，重新梳理汉传密宗的义理，为近代的宗派佛教与佛教中国化注入新的生机。而体空法师则开办了莲溪寺华严大学，重兴华严宗的义学教育于武昌。两大师继承月霞法师弘扬华严宗的志愿，重树贤首宗风，并中兴宝通、莲溪二寺，为近代湖北佛教更发新光。

而太虚大师的“人间佛教”思想，同样是在继承和总结汉传各宗教观基础上发展而来。以太虚大师的判教观念为例，其思想可谓遥承了圭峰宗密禅师的判教理念。华严宗第五祖圭峰宗密大师，在《原人论》的判教中容纳了人天教，并容摄了儒、道二家的思想，提出了人天教、小乘教、大乘法相教、大乘破相教、一乘显性教的“五教”判教论。这其实就是近代太虚大师的判教蓝本，所谓：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、大乘不共法，而以人天乘为五乘的基础。我国当代著名学问僧圣严法师曾指出，太虚大师应是受到圭峰宗密大师的《原人论》判教思想的影响，从而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论框架。[4]

人间佛教的提出，实际上是太虚大师整理传统宗派佛教，经由综摄重建而来。太虚大师在《新与融贯》一文中，自述他的佛法源流，道：“最初、本人亲近的善知识，是禅宗的寄禅老和尚 (即八指头陀) 等，对于参禅的倾向较深，对台、贤教义稍稍研究。后来自看藏经，于性、相经论的得意处，每在离言的禅意，颇契维摩经所谓文字性空即解脱性。如天台的离言谛，法相的离言自性，法性的离戏论分别，都融彻到禅宗上的不立文字，如古人所谓‘不即文字，不离文字，而为道用’。”[7] 由此观之，太虚大师的佛法真见，无疑是从宗派佛教的理路中得来。由此，太虚大师才提出以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、大乘不共法融贯的佛学体系，成为其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说人间佛教继承了中国汉传宗派佛教的性格与特点，而容纳了现代的新特色，这正是太虚大师强调的“中国佛教本位的新”。太虚大师曾对此特别说明，他说：“所云中国佛教本位的新，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，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，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，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，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。由此，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，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、麻醉于日本，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！”[7] 这样的精神无疑是当代佛教所应遵循与深化发展的理路，是当代佛教中国化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理论。具体而言，是要继承宗派佛教的遗产，而以人间佛教为路径，推进当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。

三、沿着宗派佛教路径推进当代佛教中国化进程

宗派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性成就，也是近代佛教复兴的方式，太虚大师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提出适应现代化的人间佛教。沿着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，继承宗派佛教的义理与制度遗产，我们必须从太虚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的根本精神出发，在新时代推进当代佛教中国化的新进程。

（一）宗门教下，实现汉传佛教各宗派的繁荣发展。

今日的汉传佛教各宗的发展，延续了近代以来各宗派复兴的基础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，寺院的建设与修学的恢复都有着斐然的成绩。我以为，现今的汉传佛教依然可以沿着宗派

佛教的理路，继续培育更为扎实的基础。

一方面，应该继承宗派佛教的教理与教制遗产。这需要有许多以宗派为特色的专宗寺院与佛学院，将各个宗派的义理思想与修学方式重新整理，并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修学体系。以湖北武汉莲溪寺为例，1928 年月霞法师在华严大学所培养的学僧，时任莲溪寺方丈的体空法师，在寺内创办“中华佛教湖北省华严大学”，成就了近代佛教史上又一所华严专宗佛学院。2021 年，武昌佛学院男众部（设在宝通寺）全面恢复办学，女众部设立在莲溪寺。如今的武昌佛学院尼众部设有预科小众班、本科律学班、华严专宗研究生班，与莲溪寺“持戒为本、华严为宗，净心为要，念佛为归”的宗风相得益彰，可谓是当代宗派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探索。

另一方面，寺院与僧教育应该在继承传统宗派佛教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调适发展。太虚大师曾经就佛教律仪的发展指出：“佛教律仪每因其所流传的地域而迁易，如中国的隋、唐间，僧伽律仪就演变到丛林和小庙的僧制，这也是说明当时须要这样的僧团，方能住持当时的佛教。”[12] 以此为鉴，宗派佛教也需要在契合佛法根本精神的同时，与时代环境做契机性的尝试。如武昌佛学院男众部的佛学专业课程，就综合了宗派佛教的特色，突出中观、唯识、禅宗、天台与华严圆教。

（二）本佛尊经，发挥宗派佛教的共同精神特质。

太虚大师梳理中国佛教的发展史，他站在中国佛学为本位的立场，总结中国佛教的主流包含有四点特质：本佛、重经、博约、重行。太虚大师所谓的“本佛”，是指“自道安以来的中国佛教代表人物，如慧远、智者、贤首、慧能等，都是直本于佛”，近代以来常常提倡的“回归佛陀本怀”即是此意；所言“尊经”，“就是他们都是以无上正等觉，就是佛的金口亲宣的经典为根据”，易言之，无论任何时代，佛法不能脱离经典而别寻他途；而“博约”则是“因为经的浩繁，所以他们都博览全教而约其要旨，比如道安博览众经而综理经录，天台、贤首的博综一代时教而为判摄，都是这种表现”，汉传佛教诸宗派的义理，正是经由祖师的判摄，“博约”众经而来。 此外，关于“重行”的特质，太虚大师认为，是要博览教典过程中，提出修行的心要，从而成为一种修行的实践法门，或是修净土，或是修禅观，从而以此作为“自行化他的修证法门”。[8] 这些中国佛教的主流特质，是中华文化别具创造力的体现，太虚大师就曾言：“此中国佛教的主流，充分的表现了中国人伟大的创造力，终于建立起具备深厚特质的中国佛学。”[9]

当今佛教当沿着中国佛教主流特质，要本末并重，同时也要融入新的时代精神。太虚大师在近代就指出，“现在要复兴中国佛教，应该继承佛本论的主动流，力戒孤陋的弊病，直探佛经，博搜教理，精简以取其要，见之实行；绝不是承受那一家的旧套的。”[9] 我们今天也要赓续本佛、尊经、博约、重行的中国化佛教的思想脉络，发挥宗派佛教的共同精神特质。

（三）人间佛教，回到现实人生中去践行菩萨道。

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指出：“所谓佛教中国化，最要的是在其冲淡了宗教精神，加深了人生情味。”[3] 这说明佛教中国化其实带有人间性的特点，并不舍弃人间的伦理。站在佛教的立场来看，佛教中国化就是从现实人生中去实践佛法，而非脱离人间别求解脱，这正是太虚大师倡导人间佛教的精神所在。太虚大师曾说：“在中国，向来有许多学者及一般的人，因为没有了解佛法，就对佛法作种种误会的批评，以为佛法是非伦理的，非人生的；尤其是近年来讲中国哲学和人生哲学的，误解得更加厉害。实则佛陀之说法，其动机虽是很广大的——普为一切众生，而说法的中心对象，则仍在人类众生，故佛法实是人类众生的佛法，佛所说的一切学理和道德，都离不开人间的。”[10] 可见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的学理与践行，必须站立在人间伦理与道德的基础之上，以人类为说法的中心，以人间为修行的基础，提升人格的品质，促进社会的和谐。

从人间佛教的立场出发，太虚大师对佛门的出家人与居士提出务实的建议，他在武昌佛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：“出家者有出家者之家务事业，即所谓‘宏法为家务，利生是事业’也。在家人有在家人之家务事业，即‘仕、农、工、商，各操一赡身、养家、利国、益群之业’也。否则，即为世之负债人，更何能成就佛法中超世之志业哉！”[11] 从出家僧众的角度而言，出家人应当以解脱为目标，以宏法利生为事业。同时，僧众所依止的寺院也应该为出家僧众，提供生活的保障、修道的环境，所谓“身安则道隆”，我们应立足现实，通向佛法的究竟。从在家佛教徒而言，应当立足于“赡身、养家、利国、益群”，正如太虚大师所说：“佛教最初的目标在使人民善良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康强。”当下的中国佛教的发展，无疑也要继承这样的精神，在新时代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，促进社会和谐，并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
结语

宗派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质，也是佛教契理契机的展现。宗派佛教必须不离戒、定、慧三学为根基，同时具有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征，彼此融贯于佛法而不互相对立。近代以来，佛法以宗派佛教的形式得以复兴，有谛闲、月霞、虚云、印光、弘一等大师，分别推进了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净土宗、律宗等各个宗派的综合复兴，又有太虚大师整理传统宗派，融贯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。就湖北佛教而言，在近代有月霞、持松、体空等大师在宝通寺、归元寺、莲溪寺等道场，或弘扬教义、或创办僧学，令沉寂已久的华严宗与楚地重振宗风。又有太虚大师、大醒法师等人前后兴办武昌佛学院，高树人间佛教之旗帜，实践菩萨行愿于现实人生。今日佛教应该继承这一法流，深化佛教中国化，发展中国化佛教，努力做到宗门教下，诸宗并进；本佛尊经，博约重行；人间佛教，爱国爱教。一方面，要从严治教，落实佛法戒、定、慧三学，踏实修学；一方面，要奉献人生，落实佛法的菩萨行，促进社会安定，国家康强。

利益冲突

作者声明，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。

参考文献

[1]《习近平出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》，https://www.gov.cn/xinwen/2021-12/04/content_5655877.htm

[2] 敬安著，董群编：《八指头陀禅意诗文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8 年。

[3] 钱穆：《中国思想史》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7 年。

[4] 圣严法师：《华严心诠——原人论考释》，台北：法鼓文化，2020 年。

[5]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卷 1，《大正藏》第 40 册。

[6]《虚堂和尚语录》卷 4，《大正藏》第 47 册。

[7] 太虚：《新与融贯》，《海潮音》第 18 卷 9 月号，1937 年 9 月 15 日。

[8] 太虚：《中国佛学》，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第 2 卷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4 年。

[9] 太虚：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第 2 卷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[10] 太虚：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第 3 卷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[11] 太虚：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第 19 卷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[12] 太虚：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第 31 卷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[13] 杨文会：《阐教刍言》，《杨仁山全集》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00 年。

[14] 竺人：《汉口佛教会欢迎持松体空两法师之盛况》，《海潮音》第 5 年第 4 期，1924 年 3 月。